



##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1 Ma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2021 年 5 月 11 日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根据我作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主席的职责和刘大群法官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作出的裁决,谨写信报告,塞尔维亚继续未能履行其逮捕 Petar Jojić 和 Vjerica Radeta 并将他们移交给余留机制的国际义务。

居住在塞尔维亚的被告人在余留机制审理的 Petar Jojić 和 Vjerica Radeta 案中被控藐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因为他们在检察官诉沃伊斯拉夫·舍舍利案中威胁、恐吓、贿赂或以其他方式干扰证人。干扰司法——如本案中指控的此种行为——破坏司法程序的完整性,并对实际或可能证人在有关国际罪行的审判中提供证据的意愿产生寒蝉效应。

我注意到,这种不幸的状况已持续六年有余。法庭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首次发出与被告人有关的逮捕令和移交令。在案件移交余留机制后,刘法官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发出了新的逮捕令和移交令。因此,塞尔维亚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执行逮捕令和移交令,但迄今尚未采取任何执行行动。塞尔维亚不遵行法庭和余留机制发布的命令,便是无视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承担的义务,违抗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的安全理事会。

此外,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是塞尔维亚在同一问题上的不遵守行为被第三次提交安全理事会。塞尔维亚的问题首次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由法庭庭长秘密提交安理会,之后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在 S/2017/180 号文件中第二次公开提交安理会。法庭和余留机制的许多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旷日持久的情况。

根据余留机制规约第 28 条,各国须在不进行不当拖延的情况下满足援助请求或余留机制就第 1 条所述者案件发出的命令,第 1 条中明确列入被指干扰余留机制或法庭司法工作的人员。

塞尔维亚提供的解释——即存在国内法律障碍,使其无法执行逮捕令和移交令——并不能为其不遵守行为提供正当理由。实际上,他们完全无视塞尔维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第 9 段承担的第七章义务,其中规定:



[……]所有国家应根据本决议和《余留机制规约》，与余留机制充分合作，因此，所有国家应根据国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执行本决议的规定和《余留机制规约》的条款，包括各国按余留机制根据其规约发出的援助要求或命令行事的义务。

首先，塞尔维亚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其国内法使其能够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规定的国际义务，并在该法律框架内评估 2019 年的逮捕令和移交令。

第二，虽然塞尔维亚宣称自己有能力进行诉讼，但这对其执行逮捕令和移交令的义务无关紧要。此外，在 2019 年 5 月 13 日的裁决中，刘法官排除了这一可能性，并除其他外认为，对案件的可行性至关重要的证人出于对自身生命和个人安全的担忧不愿与塞尔维亚当局合作，这使得在塞尔维亚进行诉讼是不可能的。上诉分庭随后维持了这一裁决。

在目前的情况下，显然只有通过余留机制进行公平、透明和迅速的审判，才能将被告人绳之以法。此外，通过有效的司法工作来维护法治不仅对国际一级司法程序的完整性至关重要，而且对促进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司法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的决定必须得到遵守。塞尔维亚履行其国际义务并执行逮捕令和移交被告人的命令已是时不我待。

出于这些原因，我恭敬地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塞尔维亚履行其根据余留机制规约和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承担的义务。此外，我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尽最大努力，确保 2019 年 5 月 13 日签发但尚待执行的国际逮捕令和移交令尽快得到执行。

请以安全理事会 5 月份主席的身份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主席

卡梅尔·阿吉乌斯(签名)